

十九世紀后期郑观应的改良主义思想

徐 風 晨

19世紀后期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是当时中国社会的产物。在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强烈震荡下，封建统治制度的深刻危机和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渐次成长是近代改良主义思想产生的基础。国难日深，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微弱而又发展是改良主义思想发展的基本条件。从早年的具有改良主义倾向的魏源、冯桂芬起，中间经过大约半个世纪，直到戊戌维新变法运动止，改良主义思想经历着一个漫长、艰辛的发展过程。他们在不同程度上主张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并用缓和的办法改革封建统治的上层建筑，以抵制外来资本主义国家的侵略，这些主张具有时代的重大进步意义。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致命的弱点在于它脱离群众，回避斗争，力图与封建势力妥协，失败也是自然的。

承前启后，80年代郑观应的改良主义思想在19世纪后期改良主义思想潮中占有重要地位。郑观应提出用君主立宪的代议制度来改变几千年来的君主专制的主张，是当时改良主义思潮向前发展的一个标志；也是19世纪末年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政治运动的先声。本文试就郑观应的生活历程、改良主义思想的诸方面以及影响等，作些讨论。

一

郑观应字正翔，号陶斋，晚年又号罗浮倚鹤山人。

郑观应是广东省香山县人。他的生年过去不见记载，近年所发表的文章说法也不一。^①根据郑观应诗文中：“余年四十一尚无子……是年壬午”^②；乙未(1895)年元旦诗：“抚年五十四，旅食滬江边”^③；辛酉(1921)年春致轮船招商局董事书：“今年届八十，痰喘益剧”^④等记载推算，确切的生年当为道光22(1842)年。他原出身于“藏书颇富”的地主家庭中，他父亲是“设帐授徒”的教书先生，也曾捐过光祿寺署正^⑤。

郑观应的生活经历很复杂，是一个从早期买办商人转化过来的新兴资产阶级人物。他早年读书应试不成，当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广东战乱的年代，遂弃举业，“赴滬学贾”^⑥。这是郑观应买办商人经历的开始。

上海从19世纪50年代后，由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侵略势力的扩张，迅速成为当时中外贸易的中心。19世纪40~50年代以来，英、法、美等资本主义国家在上海设置洋行，经营贸易。在这些洋行中原来由英国鸦片贩子颠地所经营的宝顺洋行势力很大，曾在这个洋行当过买办的徐润称它一时在上海洋行中是“首屈一指”^⑦。宝顺洋行多年贩运鸦片、洋货来华，经营

① 参见“中国近代思想史论文集”，99页，“历史教学”，1957年10期，18页。

② 郑观应：“盛世危言后编”，卷15，49页。

③ 郑观应：“罗浮倚鹤山人诗草”，卷2，21页。

④⑤同②，126页，49页。

⑥ 同②，卷15，42页。

⑦ 徐润：“徐愚庵自叙年谱”，9页。

湖絲、紅綠茶葉、棉花等物出口，郑观应到上海后，入宝順洋行“管絲棧，兼管輪船攬載事宜”^①，又随英華書院教習傅蘭雅讀“英文夜館”以“學西人語言文字”^②。宝順洋行停業以后，郑观应当上海和生茶棧“通事”，不久，又承办和生祥茶棧，代兩湖、江西、徽州茶客沽茶。1866年英商上海太古洋行創設輪船公司，大約在1874年左右郑观应任太古輪船公司总理兼管棧房，常年“代客办貨”^③，收購絲茶、采办荳麦、經營攬載、推銷洋貨，一直过着买办商人的生活。

值得注意的是在郑观应身为买办商人的时候，19世紀70年代后也曾投資于集股兴办的新式民營企業和工業。目前可能查出1874年“集股万兩，投資者多粵人”所办的上海滙報（旋改名彙報），即有郑观应的股份^④，老板容閔、唐廷樞等人都是郑观应的同乡。中国第一个較大的机器棉紡織工厂——上海机器織布局是在1878年底由上海几个紳商集股議办，最初的倡議者是領有撫運使銜四川候補道彭汝綜，从开始办厂就得到郑观应的贊助，他帮助墊款筹建，招集商股。彭汝綜到保定見李鴻章也保举过郑观应“会办局务”并得到札委。1880年郑观应为上海机器織布局起草招商集股章程，这个章程原用上海机器織布局同人名義刊布于世。在章程总叙中特別指出利用机器生产是“工半利倍……有利可圖”^⑤。这时，有些向资产級轉化的商人、地主、官僚、陸續入股，郑观应也“認股四方兩”^⑥。1880年底又代織布局稟請李鴻章給予独造权限并免納子口稅。由于織布局商股的要求和这时外人强爭要在上海設厂，迫于形势，1882年李鴻章才正式奏报朝廷，为織布局請得專利十年。产品在上海本地零星銷售免去稅厘，如運運内地或轉口運銷，也只在上海新关完一正稅，逢关过卡，不再抽厘。显然李鴻章的奏請也是受到郑观应等人的策动，这一点正反映着中国民族工業初兴时期资产級对封建势力的投靠。有人說李鴻章的奏請試办机器織布局一事是在1880年^⑦，那是把郑观应稟請一事誤为李鴻章的奏报了。

上述事实表明：身为买办商人的郑观应在70年代曾投資于商办或商办性質的新式企業和工業。这时，他已兼有资本家的身份。

郑观应在太古輪船公司八年。正式脫离太古輪船公司前，1881年又曾受李鴻章札委“招股創辦”上海电报局。1882年郑观应和太古輪船公司簽訂的第二次合同期滿，被招商局总办唐廷樞保荐到官督商办的輪船招商局任帮办，从此，正式脫离了买办商人的生活。

80年代，郑观应对几家新式工業“入股相助”^⑧，有投資的事实，更明显的反映出他企圖的轉化为新兴资本家。这个时期和稍后些，他曾搭股投資于盛宣怀所創办的錦州煤礦公司、烟台采矿公司、縹絲公司、三姓金矿公司；朱其詔所办的平泉金矿公司；唐廷樞所办的建平金矿公司；徐潤所开的上海牛乳公司；徐鴻复所开的同文書局；唐茂枝所办的上海玻璃公司等^⑨。

郑观应自己也曾写过他从买办商人轉化为资产級经历的过程。他說从60年代开始自己走过来的道路是：“初則学商战于外人，繼則与外人商战”^⑩。

19世紀后半期70年代以后，由于民族工業产生的条件逐漸成熟，特別是80年代后，民族

①③ “盛世危言后編”，卷18，42頁。

② 郑观应：“盛世危言”，彭序。

④ 同①，卷8，31頁。

⑤ 同上，卷7，1—3頁。另見“近代工業史資料”，第一輯下冊，1041—1048頁。

⑥ 同上，卷7，10頁。

⑦ 严中平：“中国棉紡織史稿”，102頁。

⑧ 同①，卷10，118—9頁。

⑨ 同上，卷10，118—9頁。

⑩ 同上，卷8，43頁。

資本早現出投資于新式工業的強烈願望。鄭觀應向資產階級轉化的過程，符合這種經濟發展的趨勢。他所說的參與“商戰”正代表了新興資產階級產生過程中對外國資本主義侵略勢力和國內封建壓迫作鬥爭曲折發展的歷程。

看到鄭觀應轉化為資產階級這個事實，對研究他改良主義思想的形成十分重要，標誌著他改良主義思想比較成熟了的“盛世危言”一書，產生在80年代後那就容易理解了。有人在研究鄭觀應的思想時，沒有注意到這個事實，籠統的把他說成“是一個商人出身的知識分子，具有較多的民族資產階級特性的人物”^①，顯然不合適。

作為一個新興的資產階級分子要求發展民族資本主義，不能不越來越強烈的企圖抵制西方資本主義列強對中國的侵略，又加上鄭觀應熟習一些外情，因此，1884年中法戰爭的年代里，被辦理廣東防務欽差大臣彭玉麟奏調回廣東總辦粵防湘軍營務處。此間，一度裝作商人親往西貢、暹羅等地刺探軍情，也曾到香港聯絡租船、購運軍械以援台灣防務。鄭觀應在香港聯絡租船時，被太古洋行追控拘留。原來是太古洋行藉口太古滙行買辦楊桂軒亏空行款，乘機強索兩年前保介過楊桂軒入太古洋行的鄭觀應代賠。這是外國侵略者仰仗殖民地政府的政治特權進行一次敲榨掠奪，鄭觀應雖然也找律師代之“辯護”，但維護殖民統治的法律只不過是侵略者意志的表現，鄭觀應申訴遭到失敗，不得不“代賠銀五萬元”^②，前後羈留一年，才逃出香港。這個事件，對鄭觀應刺激很大，他在詩中寫道：“天未降大任……英雄胯下辱！”^③又感到“數十年來名利盡喪”^④，不勝惋惜。償款事結後“歸里臥病三載”^⑤。1891年，鄭觀應在廣東“開平粵局”幫助開平煤礦建築輪船碼頭和棧房，以運銷開平煤到廣東銷售。次年又回輪船招商局任幫辦。中日甲午戰後，鄭觀應和盛宣懷的關係較密，曾依靠盛宣懷總辦漢陽鐵廠和江西萍鄉、安徽宣城煤礦總董。同時又主持招商局的局務，直到20世紀初年。1902年，買辦官僚頭子袁世凱繼李鴻章竊據北洋後，“所有輪船、電報均歸袁宮保督辦”^⑥，委任嫡系，人事排擠。鄭觀應離開招商局，被原來同在彭玉麟幕府中共事兩年的王之春奏調赴桂，在王之春的行營里作會辦營務處。一向以投資謀利發展工業為趣旨的鄭觀應對當個小官僚興趣並不濃，“不願久在仕途”遂“告退還粵”^⑦，在廣州擔任粵漢鐵路廣東購地局總辦職務。

1904年夏，廣州成立商務會，這是以與封建勢力聯繫較多的資產階級上層人物為核心的商工業組織。鄭觀應作過協理，起草該會創辦章程。1905年，上海和廣州等沿海城市掀起抵制美貨愛國運動，鄭觀應支持這個運動，被舉為廣州拒約會主席。他曾想趁著這個機會辦起“廣州上下工藝院有限公司”，上工藝院精工製造“小機器”；下工藝院生產多種日用商品，並包括食品工業在內。工藝院除招集內地資本外還吸收華僑資本。他認為實現這一理想，將能乘機“挽回利權”，“轉移風氣”^⑧，便於民族工業的發展。建立“上下工藝院有限公司”的企圖，一方面反映著民族工業初步發展時期的成長要求；另一方面它終未建立起來，也說明了在半殖民地社會里發展民族工業是一個十分困難的過程。

清末成立郵傳部，1909年兼轄輪船招商局。通過盛宣懷的薦舉，鄭觀應又任招商局會

① “史學月刊”，1958年1期，34頁。

② “盛世危言后編”，卷10，136頁。

③ “羅浮隱鶴山人詩草”，卷1，53頁。

④ 同②，卷15，39頁。

⑤ 同上，海行日記序。

⑥ 同上，卷4，32—33頁。

⑦ 同上，何序。

⑧ 同上，卷7，17—18頁，19—22頁。

办，这是他第三次回招商局。民国以后，历任董事。他说一生先后二十多年不离招商局，“入局办事三次”^①。1921年5月招商局开股东大会，仍留任董事。^②有人说他死于1920年^③，那是误解。

郑观应改良主义思想的产生是反映了19世纪后期中国社会的特点。

由于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自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一步一步地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④。外国侵略者依靠清政府，利用所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日益加深对中国的侵略。由于外国资本主义侵略的刺激，逐渐扩大商品市场和劳动力市场，握有货币资本的一部分商人、地主和官僚从70年代开始投资经营新式工业，这部分人逐渐转化为中国早期的资产阶级。在这个时期中，还有少数手工业工场主或中小商人开办工厂，由原来的民间工商业者上升为资产阶级。这种转化和上升的过程也是就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产生的过程。沿转化道路成为资产阶级的，因政治条件较优越、资金较大，发展快；沿上升道路成为资产阶级的，条件困难，发展很慢。因此，民族资本主义发生初期的时候，转化的道路占据优势，19世纪70~80年代出现的一些新式企业，多属于这一类。

民族资本在当时外国资本主义和国内封建势力双重阻碍下，经营新式工业是很困难的。70年代首先在沿海几个主要据点开始，直到甲午战争前，据统计共创办了一百多个新式企业。其中70年代办的主要是为出口服务的缫丝制茶和日用品工业、食品工业、印刷工业及少数机器修造、煤矿开采等方面，为数不过30几个。80年代增长的趋势很明显，特别是扩大了民用工业的经营，总数比70年代增了一倍左右。90年代初到甲午战争前，陆续出现规模较大的企业。甲午战后，民族资本开始了初步发展的阶段，到那个世纪最后一年止，5年间投资资金万元以上的，达87个之多^⑤，快于以前几十年的发展。上述情况，一方面表明民族工业发展的趋势，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发展缓慢，力量微弱。

当时，外国资本在中国已获得各种特权，资本主义侵略者依靠这些特权，倾销商品，投资于各种企业，使民族资本很难与之竞争。清政府反动统治制度，严重的束缚着民族资本的发展。因此，民族工业从它产生一开始就与资本主义侵略势力和国内封建主义有着切身利害的矛盾。19世纪后期反映新生的经济力量的阶级基础还十分薄弱，初期民族资产阶级的主要成分是从商人、地主、官僚转化过来的一部分人，他们又与封建势力联系较多，阶级处境决定了刚刚产生的民族资产阶级要冲破旧的生产关系，但又无力摆脱牢固的束缚，只能提出改良主义的要求，以发展民族资本和争取国家的独立地位。郑观应改良主义思想正是这一时代的产物。

郑观应的改良主义思想贯穿在他许多著论中。王韜代他警校过的“易言”，是郑观应在70年代“随笔割记”写成的。80年代后又在原“易言”36篇的底子上陆续增删辑成“盛世危言”，90年代出版^⑥。同时代的改良主义者陈炽给予了这书以很高评价^⑦。这书是反映郑观应80年代后改良主义思想的一面镜子。继“盛世危言”后，又续刊“盛世危言后编”，反映不少个人的生活行迹。除文集外，还有“罗浮侍鹤山人诗草”，是他“行愁坐叹”随笔手录的东西，诗中“直记时事，不避嫌怨”，充满着对时代遭迁的愤慨。

① “盛世危言后编”，卷10，103页。

② 交通史编纂委员会出版：“交通史”，航政篇，209页。

③ “史学月刊”，1958年1期，34页。

④ “毛泽东选集”，卷2，593页。

⑤ 科学出版社：“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1165—173页。

⑥ “盛世危言”55篇，据陈少白回忆，其中“农功”等两篇是孙中山所作。参见“孙中山全集”，1928年版，第一集，4页。

⑦ “盛世危言”，陈序，4页。

二

要求發展資本主義經濟在鄭觀應的思想里占有中心的地位，社會進化論是他要求發展資本主義的認識基礎。

鄭觀應認為社會經濟不斷進化，從遠古到近代是經歷了幾個階段的進化過程。他說“世界由弋獵變而為耕牧，耕牧變而為格致”是一條“世運轉移”的進化趨勢。他借用“格致”表達出資本主義的生產形態必將代替落后的封建生產形態顯示出生產上“巧奪天工”的進化^①。這種社會經濟進化的論點雖然不是真正科學的見解，不能從根本上解釋社會發展彼此相繼更替的生產方式的變革規律，但是用這種理論批駁頑固統治者把一切資本主義的生產說成是“奇技淫巧”，無疑是個新穎而進步的看法。從這個認識出發，鄭觀應特殊強調“商務”的重要，他列舉英、法、美、德等資本主義西方“以商立國”^②爭雄天下，進而痛斥把“商務”看成“末務”的陈腐觀點。他說：“欲治西人以自強，莫如振興商務，安謂商務為戕務末？”應該看到鄭觀應這裡所指的“商務”是一個包含資本主義經濟內容的籠統概念。他熱情的呼喚“振興商務”，其實是發展民族資本主義。

鄭觀應把“商務”和“洋務”作了區別並要求振興“商務”，反對以“洋務”為本的思想是值得注意的。他抨擊以“船堅砲利”為中心的思想是“逐末而忘本”，轉引德相俾斯麥的話斥洋務派“只知選購船礮，不重藝學，不興商務，尙未知富強之本，非虛言也”^③。鄭觀應對洋務派官僚有不少依靠和幻想，想得到這些人一臂之助以發展民族資本，但他和洋務派的根本主張是分歧的。統治集團中的洋務派企圖把一些資本主義的軍火生產和一些洋務納入維護封建統治的框子裡去，以維持舊的生產關係和日益沒落的反動統治。代表新興民族資產階級的鄭觀應主張發展社會生產力，逐漸改變舊的生產方式以保護資本主義的發展。反映這兩種分歧的實質是兩種生產關係的矛盾和鬥爭。

甲午戰爭前，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對中國經濟侵略主要表現為商品輸出、掠奪原料與特產品。資本主義國家商品大量湧入，壟斷市場，對興起的民族工業是一個致命的打擊。發展民族工業必須抵制資本主義的商品湧入，因此，首先不能不注意於半殖民地不平等的關稅制度。鄭觀應主張改變關稅制度，正是反映著中國社會新的經濟關係向前發展的要求。他追溯中國與西方自簽訂第一個不平等條約以來，資本主義侵略勢力在中國“輪舶云屯，貨賄山集”^④，中國時時遭受“無形侵伐”。他認為關稅稅率不合理是給侵略者開了方便之門。常年入口稅率“較之各國有輕至四、五、七、八倍者”，以後又通行“半稅單”制度，洋貨免厘，外人特權很多，甚至本來應該納關稅的商品，也往往以“充伙食”為名，概不納稅，是一種“尤屬不公”的制度。他指出資本主義各國為保護工商業發展，稅制自主，進口稅“有值百取二十、或取四十”，也“有值百取百”的^⑤。他建議仿照資本主義各國的稅則，重訂新章，改變“舍己芸人，抑內護外”^⑥不合理的稅制。自從60年代後，海關管理權握在外人手中，總稅務司、各口正副稅務司、幫辦、扦手都是外人，形成半殖民地海關管理系統。鄭觀應強烈不滿這些制度，主張“漸易華人”收回海關管理權。

① “盛世危言”，教養。

② 同上，商務。

③ 同上，自序。

④ 同上，卷三，附錄滬報變通商務論。

⑤ 鄭觀應：“易言”，上，論稅務。

⑥ 同上，論稅務。

厘金制度是19世纪中叶后推广起来的一种奇苛的半殖民地税收制度。厘金盘剥对兴起的民族工商业起着严重的束缚作用，“内地局卡林立，往往数里之遥，其间数卡”，司事、巡丁把它看作是“生财之地”，任意勾索。郑观应认为“病民之端、莫甚于里卡”，里卡不撤，“商务难以振兴”^①。呼吁“裁撤厘金、加征关税”^②，以积极促进新兴民营工商业的发展。

在发展生产方面，郑观应主张沿着集股商办或官督商办的道路，保障新兴资产阶级自由投资和经营生产的权利。他说“欲振兴商务，必先俯顺商情……凡制造之处，一体准民间开设，无所禁止。或集股或自办，悉听其便”^③，府政应该给予保护，“一切章程，听商自主”^④。他也主张“官督商办”，招商集股，借官力以维护。1881年他总办上海电报局起草招商章程中就规定“招商集股，使商受其利，官操其权”，走“官督商办”^⑤的道路。他举办上海机械织布局的时候，也是打着“奉通商大臣檄委招商集股”^⑥的旗号，“借官权以振作”^⑦而筹建起来的。在采矿方面也主张官督商办，他认为全由官办则“巨费难筹”；全归商办则“土棍或至阻撓”，最理想的办法是“商招股以兴工，官稽查以征税”，即“官督商办，上下相维”^⑧的道路。应该指出，郑观应所主张的官督商办，强调的是听商自主，只把官权当作保护、发展近代工业的条件，目的在于“助商力所不逮”^⑨。在他起草的“上海机器织布局招商集股章程总叙”中表达出这种意向，总叙写道：织布局“事虽由官端端，一切实由商办”^⑩。郑观应所主张的官督商办和封建洋务官僚所提倡的官督商办不同，后者的用意在于控制生产，壮大本集团势力，以工厂为衙门，营私舞弊，借机分肥。

半殖民地社会里，资本主义生产和扩大再生产与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势力间存在着尖锐的矛盾。因此，郑观应发展资本主义的思想和抵制外国资本主义侵略的思想是交織在一起的。它集中表现为“商战”思想。他要求改变不合理的关税制度和裁撤厘金，是想争取市场，给“商战”创造有利的条件。他又认为“器用朽窳”的手工业生产是不能和“工半利倍”的机器生产相抗衡，主张利用机器发展生产。他举出自从西方各国叩关互市以来中国遭受“商战”惨败的形势说：洋货已“畅销各口，销入内地，人置家备，弃旧翻新，耗我资财何可悉数！”常此以往再过百年，那更是不堪设想了^⑪。他提出利用机器生产，以发展近代工业，与洋商“斗巧争奇”，展开商战。

他在80年代后几年所写的“商战”一文里提出发展工业生产的“商务纲目”，这实际上是发展资本主义生产的一个蓝图。建议朝廷置商部大臣，督办“工艺”、“理财”兼“轄南北洋通商事宜”，下设商务局，工商业者“投筒自举商董”，建立商务公所，以管理和保护生产。“商务纲目”中列举发展多种生活日用品工业、食品工业以及对外出口工业品、工艺品等生产。产品求“精工细致”、“既坚且廉”、“惟妙惟肖”，除供应国内市场需要外，还“运往各国投其奢靡之好”。他又提出“設五金煤鉄等矿”开发地下资源，供应生产需要^⑫。

①② “盛世危言”，里卡，税则。

③ 同上，商务。

④ 同上，商战。

⑤ “盛世危言后编”，卷12，7—10页。

⑥ 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辑，1049页。

⑦ 同①，商战。

⑧ 同上，开矿。

⑨ 同上，商战。

⑩ “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辑，1049页。

⑪⑫ 同①，商战。

与發展近代工業相联系，郑观应主張改良交通設施，举修铁路作为溝通販运的命脈，促使“貿易日旺”^①；設立銀行，集聚資本，“商務藉可扩充”^②；办邮政电报事業，改变“跬步之間，远于千里”^③的閉塞局面，便于商民傳遞信息。

郑观应主張發展農業生产，从“地尽其利”出發，着眼点是派人“赴泰西各国，講求樹艺、农桑、养蚕、牧畜、机器耕地，化瘠为腴”^④。这是商品經濟發展要求農業生产提供工業原料，以近代農業技术經營生产的主張。这种“地尽其利”的經濟思想有利于農業資本主義的發展，比起封建統治者从維護封建剝削和自然經濟出發的“重农”思想要进步得多。

郑观应坚信实现这些要求后，中国会变成一个东方的“富国”，那时，資本主义侵略者將“怯色下气，不敢輕發難端矣”^⑤。

郑观应的“商战”思想是当时社会經濟領域中新兴資本主义与外来資本主义矛盾的产物，它反映了民族資本向前發展的意向。由于郑观应的經濟思想是代表着前进的社会力量，所以他在一定程度上揭露了外国資本主义侵略的實質。他指出資本主义西方各国靠“技巧”和“兵强”，一向把經濟落后和国勢衰弱的国家作为“取材之地，牟利之場”^⑥，争开口岸、勒訂条約，設領事保护侵略，屯兵船壯大声威，“鯨吞蚕食，虎踞狼貪”^⑦。

郑观应的“商战”思想和他的改良主义政治思想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他想在封建官僚的庇护下發展資本主义生产，靠官督商办來發展“商战”的力量，这是一个不能实现的幻想。产生这种思想正是由于当时新兴的资产階級力量異常軟弱；其中不少人也象郑观应一样和封建势力联系很多，郑观应在19世紀后期5次捐官，戴着朝廷賞賜的頂戴办企業^⑧，可以看出他对封建势力的依靠。

有人認為郑观应一向是反对“官督商办”，并引他的詩“名为保商实剝商，官督商办勢如虎”^⑨來作論証，其实这种看法不够全面。“商务嘆”那首詩并不是郑观应在19世紀后期写的，而是他在20世紀初年写成的。詩中写到一些官督商办企業的失敗时说：“国家維持報效多……官夺商权难自主……輪船局权在直督，商欲註冊官不許”，最后写到“名为保商实剝商，官督商办勢如虎……感慨时艰告君父。”^⑩从“商务嘆”这首詩中可以看出官督商办的企業經營多年并不能保护民族資本發展，相反的，官权压抑了商势，阻碍着民族資本的發展。郑观应从过来的經歷中强烈的感到这是一条窒息民族資本的道路，所以在20世紀初年才悔憾嘆息，反对官督商办。很清楚，郑观应思想变化的过程是历史实际所决定的，正象他早期主張官督商办一样，也决定于客觀条件。

三

郑观应認為要保护和發展民族資本主义經濟，必須改革君主專制的政治制度。由此就产生他改良主义的政治要求，集中表现为“議院”思想。

① “盛世危言”，铁路。

② 同上，銀行上。

③ 同上，电报，邮政上、下。

④ 同上，农功。

⑤ 同上，商战。

⑥ 同上，商务。

⑦ “盛世危言”，商务。易言，上卷，公法。

⑧ 吳尹全：“罗浮特鶴山人詩略”。

⑨ “历史教学”，1957年10期，20頁。

⑩ “罗浮特鶴山人詩草”，卷2，29頁。

郑观应对当时洋务派具有影响的“船坚砲利”的思想作了抨击。他认为求“富强”有“体”和“用”的区别。他举出资本主义西方“富强”的“体”在于“育才于学堂，论政于议院，君民一体，上下一心，务实而戒虚，谋定而后动”；“用”在于“輪船火砲，洋槍水雷，鐵路電綫”。他痛斥洋务派就是抛弃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体”，而模仿资本主义社会的“用”，所以“竭蹶步趋、常不相及”^①，不能真正的“富强”起来。他认为“穷则变、变则通”，但变的基础是“体”而不是“用”。

郑观应认为腐朽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必须用他观念中的“体”来代替。他指出腐败的封建专制政权招至外来侵略并对侵略势力采取保护的态度，外人享有特权；对内实行“病民之政”，官吏是“一事不为而无恶不作，……作官十年家富身肥，囊橐累累然数十万金在握”，不怕“人言”，不憂“民怨”^②。70年代，他主张用“議政”改革专制统治制度，仿西方资本主义议会形式，使士紳参加“議政”，伴随着新兴资产阶级的产生和要求参加政权，80年代后，郑观应明确提出“議院”主张。他根据自己的要求去解释議院是“公議政事”的机构。他讚美英国、德国君主立宪的两院制議會。他说英国虽然是“彈丸之地，女主当国”的国家，但因設“議院”，每有举措，詢謀共論，所以国家强盛起来，“得土地二十倍于本国”，后起的日本，立了議院，国势也“勃然兴起”。他把議院看成是限制昏君虐政、疆臣擅权、实现新兴资产阶级意志“君相臣民之气通”的机构。

郑观应既反对“权偏于上”的君主专制的政体；又不同意“权偏于下”“有叫嚣之风”的民主共和的政体，他主张建立“权得其平”的“君民共主”的国家制度^③。显然，他的“議院”思想的特点是君主立宪。

郑观应对西方议会制度和它的作用的看法当然是表面的。在他生活的时代，资本主义西方的议会制度日益表露出它所标榜的民主的虚伪性，郑观应从模仿的角度基于自己的理解美化和介绍西方的代議制度，无非是想改变中国几千年来的封建君主专制为君主立宪制度，以限制君权，极有限度的伸张新兴资产阶级的民权。

1884年中法战争的时候，郑观应曾上书要求建立君主立宪的议会制度，“政府以为狂妄之言”^④遭到拒绝。1895年中日战后，国步艰难、海内愤激的时候，郑观应托江苏布政使邓承修代呈“盛世危言”于清廷，建议变法图强，清廷表示只能“留覽”“盛世危言”，变法的要求又归于失败^⑤。1898年郑观应看到康有为所写的“俄彼得变政记”和“日本明治变政考”两书，表示赞扬，并希望清廷能走彼得改革和日本明治维新的道路，在一首诗中写道：“……臥薪賞胆师勾踐，湔旧維新企汉京，此际朝廷求变法，可如俄日力經營”^⑥。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康有为、梁启超避难逃至国外，康有为家眷避居香港，郑观应寄洋百元给康有为家眷，并随函写道：“惟念（康有为）救国之心，懼此重禍，甚可扼腕！”^⑦这些活动表明，郑观应一直想通过自上而下的改革，实现君主立宪的政治要求。

郑观应君主立宪的“議院”思想是当时中国社会新兴资产阶级政治意向的反映。80年代后，新兴资产阶级没有独立的政治地位，发展资本主义面临着种种困难，他们感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议会能够“通下情”代表资产阶级的利益。他们希望通过自上而下的改革把中国

① “盛世危言”，自序。

② 同上，吏治上。

③ 同上，議院。

④ “盛世危言后篇”，卷3，14頁。

⑤ 吴升全：“罗浮特鶴山人人事略”。另参见陈忠倚：“皇朝經世文三編”，卷49，10頁。

⑥ “罗浮特鶴山人詩草”，卷1，39—40頁。

⑦ “盛世危言后篇”，卷15，6頁。

君主專制制度变成“君民共主”的国家，“投匭公举”給予新兴资产階級以参政的机会。郑观应特別提到有选举权的“举主”是“有财产身家、善讀書負名望者”^①，可見选举与被选举的“民”主要是指开明士紳和新兴资产階級而言的。

郑观应的君主立宪主張，在那时外患日深的年代里，也是企圖刷新內政籍以消除外患的一种想法。郑观应認為“病弱故招魔”^②，惟有立宪才能变强，所以它又是挽救国势貧弱，抵制外来侵略的爱国主义思想的表现。

郑观应也幻想依靠清政府改革腐敗的軍事制度，他認為“号衣垢敝，槍械朽鏽”^③的武裝力量不能保衛国防。建議組成“三洋海軍”，統一指揮，加强訓練；采用“西法”，整頓陸軍，使它們成为槍械犀利具有战斗能力的队伍。郑观应的“勤修武备”改良軍事的思想是基于半殖民地中国不断被侵扰，“衛商”必須“强兵”的認識出發，这和本質上反动的洋务派把軍火当成维护統治“命脈”的思想有根本区别，这是民族自衛的要求。

郑观应要求以君主立宪为榜样改革封建君主專制的政权，一方面通过奏請聖上呼吁变法来实现；另方面想从开通民智培养人材，用潛移默化的方法达到改良主义的政治目的。他把文化教育也看成是改造封建專制統治的工具。他尖銳的批評了八股取士制度，認為这种制度是鼓励人們“將一生有用之精神，尽消磨于八股五言之中”^④，白白耗費时光，一无所用。他認為“学校者，人材所由出，人材者，国势所由强，故泰西之强，强于学”^⑤。他羡慕西方“育才于学堂”的资本主义教育，建議設立学校。州县設小学；省府設中学；京師設大学；各乡分設家塾、公塾，使人“讀書習艺”，以培养制物、制器、理財、經商、治國、治兵的知識分子。为了鼓励人材，不仿仍用秀才、举人、进士等晉阶。此外，各省設女塾、学經傳、女紅、紡織，提倡“女教”。选派留学，出洋習技艺、政律、軍事等科目，开辟一条新的受教育途徑。他主張学成回国后“授以官僚”^⑥，培养改良中国的人材。郑观应夢想通过这些教化，“一轉移間”^⑦便能出現人材济济，国势以强的局面。郑观应虽然夸大了教育的社会作用，但他对旧教育制度的批判和提倡科学技术教育等，都具有时代的进步意义。

郑观应要求在沿海各省准許有“体面”的士紳倡办“新聞报館”，以开通民智，他認為报章能使人通达时务，“足不踰戶庭，而周知天下之事。”报章又能“劝善惩惡，兴利除弊”^⑧，作为新兴资产階級的政治咽喉，駁議时政。

迴避革命斗争，靠乞求聖恩，开通民智以实现君主立宪是郑观应所理想的一条改良主义道路。这种微弱的改良主义思想，表现出和封建势力具有濃厚的妥协性，它鮮明的反映着资产階級力量的微弱和从地主、官僚、商人轉化过来的这部分人与封建势力的紧密联系。由于当时资产階級力量的微弱和郑观应認識的局限，所以表述出来的改良主义要求又帶有不少托古改制的色彩，他把所追求的资本主义东西用似乎中国古已有之来襯托，他說“古人名物象数之学，流徙而入泰西”变成资本主义的“工艺”；^⑨资产階級的議会制度彷彿是“中国乡举里选之制”；^⑩学校是“古者家有塾、党有庠、州有序、国有学”的中国古風象征^⑪，郑观

① “盛世危言”，議院。

② “罗浮僑鶴山人詩草”，卷2，42頁。

③ “易言”，卷下，練兵。

④ 同上，上卷，論考試。

⑤ 同上，西学。

⑥ “盛世危言”，考試上。

⑦ “盛世危言”，女教。教養。

⑧ “盛世危言”，日报。

⑨ “盛世危言”，道器。

应用这些望風捉影的比拟,目的在于“求助于过去的亡灵,借用他們的名字、战斗口号和服裝,以便穿着这种古代的神聖服裝,說着这种借用的語言,来演出世界历史的新場面”^①。所以,“召唤亡灵”的托古,是为了使人便于接受,用意仍在实现改制的任务。这和反动的复古主張目的不同,本質不同。

四

19世紀后期,中国社会出現民族資本主义工業,由此产生了要求發展民族工業的經濟思想,它在当时半殖民地社会里变調为“商战”的呼声。与封建势力联系較多的新兴资产阶级要求保护民族工業的發展,不能不提出改革旧的上層建筑以适应新的生产关系。正如馬克思所說:“任务本身,只有当它所能借以得到解决的那些物質条件,已經存在或至少是在形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發生的。”^②因而出現要求君主立宪以及改良主义的文化教育思想。郑观应的思想一方面反映了80年代后资本主义經濟关系的發展,另方面又是这种經濟力量十分微弱的一种象征。

郑观应的改良主义思想比起薛福成的“导民生財”,馬建忠所籠統提出的“得民心为要,議院立而下情可达”的思想是前进了一步。第二次鴉片战争后到80年代前,虽然有些改良主义者提出了“君民共治”的議院要求^③,但作为改良主义思想的主要方面来看,多是资本主义傾向或资产阶级的一些經濟要求。80年代后,郑观应等人比較明确提出来的君主立宪的政治要求,显示出改良主义思想的向前發展。郑观应对抱殘守缺封建頑固思想和买办洋务思想的斗争,对当时产生了强烈的积极影响。在半殖民地民族多难的时代,郑观应的富国和求强主張,是抵制侵略的爱国主义思想,这对促进那时的民族觉醒起了重大作用。19世紀后期先进的知識分子,从他的著作中吸取了不少有益的启示。

康有为早年是受了郑观应思想影响的一个。康有为在他的“公車上書”中所列举外国在华經濟侵略形势,受到了“商战”思想的强烈感染,其中有的文字都是轉自“商战”一篇^④。康有为以它作为斗争的一个现实根据,推动变法。

在君主專制統治下要求以君主立宪的代議制度来代替它,这是一个进步的改革思想。腐朽的封建制度是当时中国被奴役政治上的因素,又是资本主义經濟發展的束縛力量。郑观应对它鞭撻、痛斥和宣傳资本主义民主思想引起了那时爱国知識分子的注目。“盛世危言”一書,“海內傳誦”風行一时^⑤,影响实大。当时改良主义者王韜、陈熾都和郑观应关系很密,王韜代他出版“易言”,陈熾助他参定“盛世危言”草稿,都受到郑观应的思想影响。1894年甲午战争的时候,孙中山开始了他上書的政治活动,北上途中在上海迁到郑观应和王韜。“上李鴻章書”据說曾得到王韜亲笔修改^⑥,書中所提到的“人尽其才、地尽其利、物尽其用、貨暢其流”的思想和郑观应的主張先后呼应,这时仍具有濃厚改良主义思想的孙中山从“盛世危言”一書的思想里吸取些所需要的东西,也是可能的。可見“盛世危言”一書

① “盛世危言”,議院。

② 同上,学校。

③ “馬克思恩格斯文选”,第1卷,223頁。

④ 同上,第1卷,141頁。

⑤ 王韜:“弢园文录外編”,卷1,21—3頁。

⑥ “戊戌变法”資料叢刊,第2冊,131—154頁。

⑦ “罗浮僊鶴山人詩草”,盛序。

⑧ 陈少白:“兴中会革命史要”,93頁。

的思想对那时先进的知识分子具有强烈的吸引力。

郑观应改良主义思想的弱点，正是民族资产阶级所固有的妥协性的深刻反映，民族资产阶级对广大人民群众反封建斗争是惧怕的，不能联系群众，处境是极其孤立的，要求改变封建统治，但又期望依靠封建统治者的有力支持来实现它，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这只能是个空想。近代的改良主义者包括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政治运动——短命的戊戌变法在内，企图不改变封建统治的根基，求得国家富强起来，都曾是以失败的尝试。郑观应19世纪后期的改良主义要求，失败是自然的。改良主义政治运动失败后，有的改良主义者跟上时代，从经历教训中不能不转向革命，继续前进。也有的改良主义者当资产阶级革命高潮来临的时候，仍坚持与封建势力妥协的道路，反对革命，成为历史前进的阻碍；或灰心愤世，没落自终，郑观应晚年四处寻道求仙，想入非非，或“抛家欲入山”^①，或“白髮哭江湖”^②，走的是这条道路。它的结果也反映出半殖民地社会里民族工业艰辛、失败的命运。

郑观应对资本主义国家本质的认识是不清的，他一面看到资本主义国家“群雄似虎狼，暴虐无伦理”^③，另一方面又幻想某些资本主义国家能同情中国的贫弱地位，帮助中国，走向独立。甲午战后当民族危亡的时刻，他曾渴望日本能“赤手授饥溺”^④，他不了解资本主义国家都是一丘之貉，近代中国的贫弱首先是资本主义国家奴役的恶果。他要求摆脱资本主义国家的侵略和压迫，但认识不到潜藏在人民群众中的反帝斗争的巨大力量。这正反映了他阶级地位和认识上的局限。

郑观应的思想是近代中国社会的历史产物。历史又证实了它是一个不能解决当时中国社会问题的改良主义迷梦。毛泽东同志精辟论述过近代中国先进人物向西方寻找真理和“理想总是不能实现”的失败遭遇，指出资本主义的方案，根本完成不了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

“因为中国是受帝国主义压迫的国家，唯一的路是经过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⑤。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千辛万苦，英勇斗争，终于取得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当代中国人民的历史任务，再也不是民族独立和发展资本主义问题，而是在党的总路线光辉照耀下，把我国迅速的建成一个具有高度发展的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这是改良主义者如同郑观应等人所根本梦想不到的。

① “罗浮倚鹤山人诗草”，卷12，47页。

② 同上，卷2，59页。

③ 同上，卷2，23页。

④ 同上，卷2，12—13页。

⑤ 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5页。